

从前个体情动到社会性情绪

——情动理论视角下的集体情感

田林楠

摘要:在以情感转向为代表的情感研究浪潮中,有关集体情感的研究未能跟上个体情感研究的步伐。已有的集体情感研究,无论是个体主义还是涌现主义模型,都因其“原型情感能够完整传递”的假定而面对诸多理论困境。从情动理论出发,集体情感的形成可以被视为从前个体情动到社会性情绪的过程:经由情感流通、情感表达和情感教学等机制,特定刺激所带来的无定形情动状态被结构化为具体情绪范畴,从而为群体中的个体所共同理解并共享。但是,具有明确社会文化内涵的情绪范畴无法完全捕捉或包含流动的情动状态,而情动剩余物的存在则意味着集体情感并不是可以被任意操纵的。

关键词:集体情感;情动;情感流通;情感表达;情感教学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3.008

一、引言:落在个体情感研究身后的集体情感研究

虽然很难指出明确的开端,但可以大致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场席卷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情感研究革命”推动了一股强劲的情感研究潮流,不同学科都出现了“情感转向”的范式变革趋势^①。情感研究组织的纷纷建立则巩固了情感研究的发展:1984年,跨国国家、跨学科的情感研究组织“国际情感研究学会”成立,2009年该学会创办了《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杂志,不同学科组织也成立了各自的情感研究机构。随着知识潮流的转变和研究组织的建立,情感研究取得重大进展:1995年有心理学家指出,“过去20年,情感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②;2009年,社会学家特纳则总结道,“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十年,情感研究都在不断发展,现在可以说是微观社会学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某些宏观社会学的前沿”^③。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不同学科的情感研究大幅推进,但是已有研究基本集中在个体情感层面,“明确致力于集体情感的研究并没有跟上个体情感研究的步伐”^④。

集体情感虽然从未进入过由个体情感分析所占据的舞台中心,但其一直存在于社会和行为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研究议程之中^⑤。不仅如此,如今有关集体情感的研究在社会学、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中还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是,研究者对已有的集体情感研究文献分析之后发现,“令人吃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个人日常交往模式变迁研究”(21CSH017)。

作者简介:田林楠,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苏州 215123; tianlinnan@163.com)。

① Barbalet J.,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 成伯清:《情感的社会学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向”: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情感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Reddy W.,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ix.

③ Turner J.,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Basic Theoretical Arguments”, *Emotion Review*, 2009, 1(4), pp. 340-354.

④ Scheve C., Ismer S., “Towards a Theory of Collective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2013, 5(4), pp. 406-413.

⑤ Scheve C., Salmela M., “Collective Emotions: An Introduction”, in von Scheve C., Salmela M. (eds.), *Collective Emotions: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xv.

的是,对于集体情感究竟是什么、集体情感与现有的个体情感理论的关系、如何从方法上对集体情感进行研究的概念分析是罕见的”^①。

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集体情感理论的两类模型,并指出其共享的基本假定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为克服这一困境,本文通过辨析情动(affect)、情绪(emotion)这对概念^②,并利用情感流通、情感表达和情感教学等情感分析观点,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说明集体情感是如何从一种模糊矛盾的前个体情动状态最终成为个体间共享的明确情绪,从而在概念和理论层面推进集体情感和个体情感关系的研究,更好地理解集体行动以及公共舆论中集体情感的形成过程及其可能演变方向。在当代中国,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的公开表达,进而引发集体情感并形成强大的公共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公共领域出现的这种“新的激情政治”^③,要求我们从细部探究集体情感的形成与演变机制,更好地理解群体如何体验情感并依据情感行事,从而有效应对由“众怒”等集体情感所引发的重大舆情事件。

二、集体情感的两类模型及其共同假定

集体情感^④的文献可以用两个模型来总结概括:其一是自下而上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t)视角,其二是由外而内的涌现主义(emergentist)视角。在后者看来,集体情感可以归于集体主体(及其对个体自上而下的强加),而非来自单个个体或群体成员,而对前者而言,任何本体论意义上对集体主体的假定都应该被抵制,集体情感只是个体情感的趋同和协调^⑤。但是,这两个看似相悖的模型却共享着相同假定,而正是这一假定导致既有模型未能识别出集体情感的“成就”特性。

(一)个体主义模型

勒庞的《乌合之众》尽管后来遭遇广泛批评,但在20世纪中期对群体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个体主义模型的思想基础。勒庞持有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否认群体或集体本身可以具有某种情感状态,集体情感不过是一种复数术语,是众多个体情感的趋同性集结。他认为,集体情感是所有群体成员的情感沿着某个单一情感方向迅速强化的结果,而诸个体的情感之所以同方向聚合,则端赖于群体成员的易受暗示性和情感的群体传染性^⑥。即便个体之间在信仰、价值、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极强异质性,一旦他们聚集成群,那么无论个体原先持有或不持有何种情感,都会卷入并感染上其他群体成员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模式,进而群体中每个个体的情感不断收敛融合为同一种情感,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of crowds)。群体心理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在其《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则专辟一章讨论《乌合之众》,他基本赞同

① Scheve C., Ismer S., “Towards a Theory of Collective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2013, 5(4), pp. 406-413.

② 在本文中,“情绪”与“情动”这两个术语主要在情动理论语境下进行区分;而在非情动理论语境中,以及情动理论语境中无需作出明确区分时,皆使用“情感”,将其作为最广义的术语。

③ 袁光锋:《“众怒”的年代:新媒介、情感规则与“愤怒”的政治》,《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袁光锋:《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一个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④ 就像“情感”这个概念一样,“集体情感”也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鉴于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辨析集体情感的类别或划定集体情感这个概念的边界,而是分析个体间如何才能共享相同的情感体验,也即需要历经何种过程和机制才能达至这种“成就”。因此,本文将以一种广义的方式使用集体情感概念,在情感强度和持续时间等维度上都具有最大伸缩性。本文中的“集体情感”是指在共同经受或关注某种刺激、某个事件之后,诸多个体的情感反应经由某种过程而不断趋同,逐渐收敛至某种相同或足够相似的情感反应,同时,因为明确识别出或模糊地感知到其他人与自己有着差不多的情感反应而将这种情感反应体验为“我们的情感”。

⑤ Protevi J., “Political Emotion”, in von Scheve C., Salmela M. (eds.), *Collective Emotions: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26.

⑥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勒庞的观点,将集体情感视为个体感知到他人“情感状态迹象”后自动与他人保持一致的结果,“能同时观察到相同情感的人越多,这种自动强迫性就越强……让自己陷入到同样的情感中”,因此群体心理的一致性必须从个体心理中寻找解答,所谓“在更广的视角中,个体心理学就是社会心理学”^①。

至今,将集体情感视作个体情感总和的个体主义模型,依然是理解集体情感的核心框架。有学者在从“移情的神经科学”来反推集体情感的形成机制时,同样是将勒庞所指出的个体在群体中“完全失去人格意识”导致易受暗示和传染,提炼为“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他人区分是集体情感体验的一个假定机制”。也即,移情需要观察者紧密追踪感受到的情感的来源,但一旦个体失去自我/他人的界限,情感来源便难以确定,导致个体陷入情感传染的状态,使得群体中的个体情感高度同步^②。

总而言之,个体主义模型强调,只有个体能够经历特定情感,群体本身并不能作为一个主体身处某种情感状态。这种模型从内向外、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始于个体及其内在感受,然后扩展至周围的其他个体,并可能以相似的形式返回。通过这一过程,个体与他人的情感趋于一致并统一,形成了一种似乎整齐划一的心理或情感群体,由此便构成了集体情感。

(二)涌现主义模型

与个体主义相反,涌现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由多人互动产生的宏观层面的情感过程,且这种情感并不仅仅是群聚个体的情感状态的集合或加总。如果说个体主义模型中的集体情感是个体情感体验的协调统一,是作为个体属性的情感的传递移动,那么涌现主义模型则认为集体情感的特征与个人情感贡献的总和有着质的区别,强调集体本身作为情感体验主体所具有的情感,而这种“单数的”集体情感向下向内强加进而导致个体具有相同的情感。

涌现主义模型与涂尔干对个体主义模型之心理学倾向的批评密切相关。涂尔干所主导的《社会学年鉴》曾明确批评塔德等人所使用的“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概念,并指出应该使用“集体心理学”(collective psychology),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是词汇差异,而是与涂尔干的社会学立场有关,他认为集体性的东西是真实的,且具有因果效力,而每个个体都将“从外部接受它们”^③。因此,集体情感绝非源自诸多个体感受的总和与趋同,而是来自外部力量例如社会潮流的强加,“集会发生的激情、义愤、怜悯等情感方面的巨大冲动,就不会是产生于任何个人的意识,而是来自我们每个人的外部,不管我们每个人愿意与否,都会受到感染”^④。柯林斯将这一概念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小型仪式,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社会互动的微观过程也可能产生集体兴奋并由外而内地为个体注入群体依恋或群体团结的感觉。对柯林斯而言,互动仪式就是情感的转化器,将个体同时具有的某种个人情绪状态(无论是参加葬礼仪式之初的悲伤还是参加婚礼仪式之初的喜悦)转化为一种新的集体情感或“更高层次的社会情感”——“团结的集体兴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of solidarity)。而这种集体兴奋具有极强的支配力,会驱散个体持有的任何其他感情,而只留下进入个体的集体情感^⑤。

因此,涌现主义的集体情感模型提出了超越个体的集体主体概念,认为集体情感是从个体互动中

① Freud 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ranslated by Strachey J.,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p. 22; 珀森·埃塞尔:《论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尹肖雯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71页。

② Lamm C., Silani G., “Insights into Collective Emotions from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in von Scheve C., Salmela M. (eds.), *Collective Emotions: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3.

③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15页; Turner S., “Mirror Neurons and Practices: A Response to Lizardo”,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07, 37(3), pp. 351-371.

④ E.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页。

⑤ Collins R.,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in von Scheve C., Salmela M. (eds.), *Collective Emotions: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00;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6—87页、160—161页。

涌现的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的情感,具有强制性和支配力,能够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向个体流动,同质化个体的情感反应。

(三)个体主义与涌现主义的共同假设及其问题

尽管个体主义与涌现主义在集体情感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对立,他们却共享一个基本假设:集体情感的形成似乎依赖于一个原型情感或情感程序,或者通过个体之间的无损传递,或者通过集体主体自上而下统一地分配给每个个体,最终使得每个个体都无差别地拥有该情感。在个体主义模型看来,尽管集体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情感,但是任何个体的情感都恰好与其他人的情感相同,只是这种相同并不是偶然的或随机的,而是通过非理性的暗示和传染机制实现的,类似一种情感程序在众人之间被复制粘贴。而涌现主义则视集体情感为“中央服务器”,个体就像从中下载并安装了相同情感程序的设备,也即集体中每个个体的情感都是由集体从外部统一强加到个体内部的。

然而,这种假定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随着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群体中的个体不再是完全无理性的,而是能够对自己的利益作出理性选择^①,那么,即使暂且不论情感是否能够无损传递的问题,通过暗示和传染传递情感的机制也变得可疑。其次,涌现主义模型忽略了情感生活的个人层面,特别是个体拒绝外部情感压力的能力。研究显示,个体可能通过拒绝内化期望的情感,体验到“空洞”的互动仪式,或对精心安排的聚会和象征性符号感到不动心^②。因此,集体情感无法像涌现主义假定的那样,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地传递到每一个个体。第三,即便原型情感的传递机制有效,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反应能力的个体如何能统一理解其他个体或集体主体的情感仍是一个问题。换言之,情感的传递过程中,由于个体理解的差异,原型情感可能会发生变异^③。

综上所述,集体共享某种情感“并不意味着一种情感简单地从一个个体传递或者‘跳跃’到另一个个体上”^④,它并不是“一体成型”且稳定不变的,而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成就”(achievement)。而无论是个体主义还是涌现主义模型都无法有效地回答:在经历某个事件、互动和刺激之后,个体之间经由何种过程和机制(而非无损传递)才最终共享某种情感?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最终共享某种情感是否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从一开始就有某种基本一致的反应、感受和体验(也即是否存在一种原型情感)?在这种共享的情感之外,集体中的个体是否还有其他无法被共享的情感范畴所涵盖的情感体验?

三、从情动到情绪:集体情感形成的基本过程

集体情感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和一种“成就”,而非一开始就是某种可以用情感符号命名并明确表达的定型之物,它还可能是或可能“途经”一种不确定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状态。集体情感形成的过程往往起始于难以言说的情感状态,如愤怒和悲伤并不是“9·11”事件后第一时间就被集体性地宣称并进入美国民众的自觉意识之中的,相反,他们最初的情感体验只是一种无言以对的空白和震惊,人们“缺乏”进入自己感受的渠道,因而“未能叙述”^⑤。直至经由公共话语的界定和流通,最初模糊的情

①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8—29、182页。

② Riis O., Woodhead L., *A Sociology of Religious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4.

③ 例如,民众由于经济危机而产生的对政府的不满和怨恨,很可能在传递过程中迁移变异为某种集体性的种族怨恨。Ross A.,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2; Turner S., *Brain/Practice/Relativ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p. 11.

④ 萨拉·艾哈迈德:《社交的幸福》,载戴尔·斯宾塞、凯文·沃尔比、艾伦·亨特编:《情感社会学》,张军、周志浩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7页。

⑤ Holland J., “9/11 and Critical Terrorism Studies - the Emotion, Culture, and Discourse of the ‘War on Terror’”,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2021, 14(4), pp. 441-444.

感波动才被定型为具体的愤怒和悲伤,才最终“叙述成功”^①。如果调用情动理论的划分,“9·11”事件后美国民众的集体情感反应是从最开始的无法言说的情动直至被话语捕捉概括为可以明确表达的情绪。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集体情感的不同层面及其形成过程,我们需要借用情动理论的惯例,将情感区分为情动和情绪。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感觉到些什么,但对于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即使本人也没有访问的特权,我们无法明确地知晓它是什么,它就这样以一种不规则的形态在意识的边界自由飘浮^②。虽然这种感觉对个体来说是不透明的,未曾经过意识的处理,但它仍然切实地影响着个体。例如古尔德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发现,除了类似愤怒这种明确的情绪之外,还有很多在我们意识和话语之外的情感状态在起作用,而这些不受认知加工束缚的、模糊的感受状态就是情动^③。当身体与其他身体或物体发生感触时,会产生某种身体能量或强度(intensity),情动就是对这种身体强度的非意识体验——我们受到某种影响,并对此有所感受,但不知道也说不出那是什么。换言之,情动被界定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前语言空间,是处在与其他身体关系中的身体在没有意识或表征干扰的情况下而迸发的潜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视为“前个体的”(pre-individual/personal)^④。

马苏米将情绪视为情动被话语捕获之后的惯例性表达,是“社会语言学”对身体所经受的强度的识别、命名和占据^⑤。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情动的力量和强度导致了情绪的产生。如同上文所述,作为身体强度的情动能够让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些什么,同时,情动还具备一种类似疼痛的机制,就像疼痛能够放大我们对“伤口”的感知,让我们立刻关注“伤口”一样,情动也让我们关注我们的感觉,并试图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而在试图弄清身体强度所激起的模糊感觉的过程中,我们必然求诸现有的社会文化惯例以及我们自身的习惯与经验。如此,无结构的感受就被社会文化所结构化的具体情绪词汇表达和命名并在此基础上沟通互动,而个人与集体也正是通过这些语言和知识模式赋予其感受和体验以社会意义。就此而言,情绪可被视为社会性的(social)^⑥,每一个情绪词汇都包含了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内容、意义与象征。

因此,从情动到情绪就是一种将无可名状的前个体感觉状态具体化为社会性情绪的过程,但这一命名和完形过程并不能完整地抓住并确切表述那种感觉状态,社会文化惯例对情动的捕获总是伴随着情动的逃离。就此而言,人们总是倾向于将社会文化惯例分配的情绪误解为其情动状态的表达,或误解为他所感受到的东西的总和,但事实却是情动的潜能总比它在社会中实现的东西更多^⑦。虽然情绪并不是对情动状态“原义”的如实“翻译”,但只有通过话语的锚定和命名,进而将模糊的感觉状态(尽管是不完整的)带入被社会文化所共享的话语框架之内,个体和集体才能通过这种话语表征、沟通和共享那种无可名状的感觉。而情动的非固定性和无限制性也为话语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因为

① Solomon T., “‘I Wasn’t Angry, Because I Couldn’t Believe it Was Happening’: Affect and Discourse in Responses to 9/11”,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 38(4), pp. 907-928.

② 不仅是我们将要叙述的情动理论持有此种观点,精神分析学家也大都同意“精神分析处理感觉与情感世界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感受到的各个方面”。详见 Radstone S., “Theory and Affect: Undivided Worlds”, in Perri S., Radstone S., Squire C., et al. (eds.), *Public Emo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85.

③ Gould D., “On Affect and Protest”, in Staiger J., Cvetkovich A., Reynolds A. (eds.), *Political Emotions: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25-26.

④ Papoulias C., Felicity C., “Biology’s Gift: Interrogating the Turn to Affect”, *Body & Society*, 2010, 16(1), pp. 29-56.

⑤ Massumi B.,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27.

⑥ Gould D., “On Affect and Protest”, in Staiger J., Cvetkovich A., Reynolds A. (eds.), *Political Emotions: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26-27.

⑦ Massumi B.,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35.

情动“能够以各种非预定的方式被使用、引导和调动”^①。

因此,情动状态只有被话语转化为情绪符号时才能在认知层面被理解、传播和沟通,而情绪话语“翻译”情动的过程,也塑造了我们进入和体验情动的共同方式和角度。特定事件或刺激所带来的看似孤立、不可理解、前社会的具身情动状态,在被具有特定社会文化意涵的话语转化之后,也就获得了可理解和可分享的社会性内容,而正是这些社会文化内容支撑起了个体间的共同理解,从而将孤立的情动体验转化成为集体经历,为集体情感的形成奠定基础。因此,仅就性质和过程而言,集体情感的形成首先意味着前个体情动状态被命名和表征为社会性情绪,赋予某种程度上无法表达和沟通的情动状态以一种集体和社会的维度。

四、情感流通、情感表达和情感教学:集体情感形成的基本机制

如上节所述,将无定形的情动状态表征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情绪,虽然不可避免得不完整,也并不必然导致情绪的集体共享,但它将私人的感受和体验转化为能够在公共空间中表达、理解、交流和共享的话语。这使得具身性的个体感受能够以公众可以理解的形式扩散并产生社会影响,进而为集体共享某种情感提供了可能。而要实现情感的集体共享,还需要一些基本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情感话语的传播为集体共鸣提供了入口,并将个体紧密地黏附在一起;利用广泛流通的话语符号进行情感表达,从而集体强化和确认话语符号所表征的情感体验;借助这些被不断唤起和表达的情感实现情感教学,使得这些情感获得某种公理化的自然属性,同时抑制了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绪反应。

(一)情感流通

在对集体情感的社会想象中,通常假设个体在特定社会事件或某种刺激下共享特定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例如,人们倾向于认为,在恐怖袭击后民众会普遍感到对恐怖分子的愤怒和恐惧,正如“9·11”事件后的美国公众反应。然而,对袭击者的愤怒和恐惧只是“一种常见的反应,但不是一种自动反应”。马德里爆炸案发生后,西班牙民众的反应主要是对政府的愤怒,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针对恐怖分子。这表明,无论是指向恐怖分子的愤怒还是针对本国政府的情绪,都不是自发形成的,它们的形成依赖于话语符号的流通^②。正如情动性感受无法通过语言完整有效地表征,但却必然依赖语言赋予其形状和意义,从而成为可沟通和分享的,同样,也正是通过话语符号的表征与流通,更广泛的社区或整个社会才可能“在情感上受到影响,并体验到与受害者休戚与共的团结感”^③。

恐怖袭击事件激发的情感并非单一或稳定,而是复杂且难以具体描述的情动或情感震荡^④。“在‘9·11’之后的最初时刻,目击者喘息着,但找不到话语来表达他们的感觉”,整座城市呈现出一种“完全沉默”的景象^⑤。这种情况下,人们缺乏表达和共享情绪的语言工具,共享某种情绪感受也就无从谈起。当政府官员和媒体开始使用如“珍珠港”等叙事框架定义恐怖袭击,也就开始为民众注入强大的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联想并具有相当的规范性,从而将民众无法言表的情动状态定位在历史上根深

① Gould D., “On Affect and Protest”, in Staiger J., Cvetkovich A., Reynolds A. (eds.), *Political Emotions: New Agendas i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27.

② Ross A.,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p. 90-92.

③ Hutchison E., *Affective Communitie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47.

④ Ross A., “Coming in from the Cold: Constructivism and Emo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12(2), pp. 197-222.

⑤ Holland J., Solomon T., “Affect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Articulating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9/11”, *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 2014, 2(3), pp. 262-277.

蒂固的共同理解方式中。也即直到官方话语和传媒话语开始形成并广泛地传播流通时,民众才开始找到理解和表达自身情动状态的共享渠道,并几乎毫无差别地将自身无确切形状的身体强度统一地编码为明确的情绪——愤怒和悲伤。“话语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它在其中流通、标记并赋予意义”^①,因此,公共情绪话语的形成与流通,创建了一个公共环境,个体的私人性内在震动在其中被由外而内地集体编码为具有共同社会意义的特定情绪,进而将主体黏附串联在一起。换言之,情感的社会效应不是由特定符号或对象直接产生的,而是通过这些符号和对象在社会中的流通而产生。

具体来说,情感不是主体的属性,亦非驻留在客体之中,而是作为符号或客体的流通(circulation)效果而产生的。符号或客体流通得越多,也就越显得“含有”情感,或者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情感价值。而当看似“含有”情感的符号和客体不断地在特定人群中循环流通时,也就不不断地把人群中的不同主体黏着(sticking)在一起,进而产生了集体的效果,或者说“正是情感的非寓居性(non-residence)而使其具有黏合作用(binding)”^②。因此,虽然恐惧和愤怒的情绪并不在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视频和图片符号之中,也不在新闻主播和外交政策专家不断提起的与珍珠港相关的各种符号中,但是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不断积累恐惧和愤怒的情感价值,逐渐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有共鸣的和情感的话语,以至于‘9·11’这个词或双子塔的照片代表了一整套的思考、感受和谈论方式”^③。换言之,就像蛇的符号积累了恐惧的情感价值一样,双子塔或“9·11”也积累了愤怒和恐惧的情感价值,使得遭遇这一符号的不同个体能够集体性地产生类似的情感反应,正是“客体的流通使我们能够思考情感的社会性”^④。

(二)情感表达

“含有”情感的符号的广泛流通让人们以共通的视角体验模糊的情动状态,而找到相应的话语和符号则开启了表达情感的通道。但情感表达不仅揭示了已存在的情感,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情感本身,具有“自我探索”和“自我改变”的作用,也即情感表达能够确认或改变所宣称的情感,增强或减弱其强度^⑤。

情感表达之所以能够改变情感,则是与雷迪所认定的情感特性密切相关。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情动与情绪的划分,但是雷迪对情感的界定与此异曲同工。在他看来,情感就是一系列并没有固定联系的思想材料,被同时激活但过于庞杂以至于不能完全通过话语转化。因此,情感表达只是对这些思想材料部分转化,而当个体挑选某种情感词汇来表达进入注意力的部分思想材料时,不可避免地会确认或增强这部分思想材料,而如果选择压制它或不去想它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⑥。

情感表达内在地具有集体性。因为只有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利用共同可理解的语言符号才能够完成表达,并且情感表达还有助于识别出其他人的情感从而与更大的群体一起表达情感。古尔德

① Radstone S., “Theory and Affect: Undivided Worlds”, in Perri S., Radstone S., Squire C., et al. (eds.), *Public Emo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90.

② Ahmed 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18-120; Ahmed S., “Affective Economies”, *Social Text*, 2004, 22(2), pp. 117-139. 需要说明的是,艾哈迈德所提出的概念“情感流通”之英文原文是 circulation of affect, 但在她的整体语境中, affect 并不是在情动理论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将其作为 emotion 的替换词而已。在其详细阐述本概念的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一书的后记中,她明确强调无法真正地区分出何为情绪、何为情动,因此在该书及其专篇论文中, affect、emotion 以及 feeling 都是同等使用的。换言之,在她的理论体系内,不同的术语都可以译为“情感”,一种包含情感所有层面的通用术语。因此,本文在英文摘要中用 emotional circulation 代替 circulation of affect.

③ Holland J., “9/11 and Critical Terrorism Studies—the Emotion, Culture, and Discourse of the ‘War on Terror’”,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2021, 14(4), pp. 441-444.

④ Ahmed 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8.

⑤ Reddy W.,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3.

⑥ Reddy W.,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99-91, 103-104.

认为,“情感表达也在集体层面运作”^①。因此,当美国的政治和媒体机器不断播报恐怖袭击对美国民众造成的伤害时,其实也是在集体地表达“美国人”的愤怒:一个最初无法言说的事件被集体确认为“犯罪”,一个让人“毫无感觉”的刺激被集体构建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攻击”,一个起初“我不愤怒”的状态被集体印证为“比他们对我们的打击大十倍”的极度愤怒。换言之,当美国民众普遍地利用愤怒和恐惧话语来表达和沟通他们无定形的情动体验材料时,也就是对恐惧和愤怒的进一步确认和集体性确认。

不过,雷迪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问题,也即哪些情感表达会确认/强化个体所挑选的情感表达符号,哪些则会否认和弱化,而这涉及情感话语的“可信度”问题。情感话语的欺骗性在于,它们是对复杂情动状态的简化表达,其意义和重要性来源于话语构建的意义世界^②。就此而言,具有确认/强化效应的情感表达所使用的话语符号一定被视作切实可信,并且能够得到深度情感共鸣。马德里爆炸案之所以导致民众对西班牙政府集体性愤怒,也是因为西班牙政府提供的叙事和话语符号——将爆炸案归咎为巴斯克分离主义政党,未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共鸣,相反,在示威游行中逐渐形成的对西班牙政府参与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恐怖袭击的叙事,逐渐赢得了民众的共鸣。悲伤和愤怒的情绪才逐渐从最初模糊的“不安感”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人们表达和沟通的主要话语^③。因此,特定情感表达正是通过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而获得力量和可信度,也即某种情感表达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情感吸引力”,是因为它能够将居无定所的情动流牵引至该表达范畴之内,“占上风的政策和政治叙事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④。

(三)情感教学

由社会文化所结构化的情感表达,最终无法完全捕获情动体验,总有某些思想材料或身体强度感受逃脱了追捕,诸如“我非常愤怒/快乐”并不是社会刺激对身体的冲击所带来的全部感受。而逃脱的情动状态,仍然被个体所感受着,并对个体施加强度,促使个体想要弄清楚这种感受到到底是什么——因为个体对转化并塑造了自身感受的情绪话语并不满意或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哪里不对。因此,雷迪认为,情感表达一方面能够将矛盾复杂的情动状态简化明确为特定情感范畴,但另一方面剩余物的存在又让情感表达留下了被怀疑的空间^⑤。因此,集体情感的形成中,还有另一种机制发挥着“情感教学”的作用,用以增强流通中的话语符号和情感表达的可信度。

古尔德观察到,社会运动通过“情感教学”(emotional pedagogy)引导人们的情感体验和反应,“社会运动的背景不仅为人们的情动状态提供了一种语言,而且还提供了某种情感教学,指导人们感受什么和如何感受,以及根据这些感受应该做什么”^⑥,这同时也限制和封堵了其他进入情动感受的入口。以美国艾滋病运动为例,其早期因努力自救而盛行的英雄话语将疾病所带来的复杂情动潜力解读为自豪,压制或化解了情动潜能中涌动着的其他方向的感受,如对同性恋的羞愧或对政府不作为的愤怒^⑦。

① Gould D., *Moving Politics: Emotion and ACT UP's Fight against AI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 38.

② Glynos J., Stavrakakis Y., "Lacan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Fantasy and Enjoyment in 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al Theory", *Subjectivity*, 2008, 24, pp. 256-274.

③ Ross A.,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p. 85-88.

④ Hutchison E., *Affective Communitie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1-142.

⑤ Reddy W.,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7, 38(3), pp. 327-351.

⑥ Gould D., *Moving Politics: Emotion and ACT UP's Fight against AI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 28. 另外,在 emotional pedagogy 这个概念中,emotional 泛指所有情感现象的总称(详见该书第 22 页),是一种广泛的用法,因此遵从本文的统一用法译为情感。

⑦ Gould D., *Moving Politics: Emotion and ACT UP's Fight against AI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56-59.

因此,群体中广泛流通的标准情感话语其实包含了一种“情感教学”,当美国民众运用媒介中反复出现的反恐战争话语来命名自身的情动状态并反复唤起恐惧和愤怒情绪时,就会形成一种集体的、不自觉的情感倾向,它构成了群体成员的情感模板,此时某些情感似乎获得了公理般的品质,构成了该情境背景下的“情感惯习”^①。通过情感教学,不仅形成了会被个体无意识接受的情感惯习,而且会逐渐型构出霍克希尔德所说的感受规则,群体中的个体会有意识地积极地评估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以遵守该情境背景下的社会文化规范。就此而言,情感教学构成了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区分了正当/应当与不正当/应当的情感反应。马德里爆炸案后,参加守夜活动的人群通过短信和人际关系网络等反复命名和唤起一种针对西班牙政府的愤怒,它一方面教学并授权了在此种态势下应该向谁表达何种感受,另一方面则压制和淡化了其他感受及其指向的对象(也即对恐怖分子的愤怒与仇恨)。因此,社会刺激(例如恐怖袭击)所带来的情动状态并没有固定的、统一的和自动的转化方向,很多时候会出现多重相互竞争的话语,而最终何种情绪被广泛共享则与群体中反复表达和唤醒的情感所发挥的情感教学作用密切相关,它赋予某种情感合法和自然的地位,并使其他情感反应成为不合时宜的。

但情感教学的作用是有限的,那些未被命名和引导的无定形的情动状态只是被暂时压制或淡化了,而并未消失,它仍然能够被感受到,并涌动着要求进一步解释的力量。同一群体的集体情感之所以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的情感话语未能包含和压制住的身体强度,强力地寻求一种有意义的解释,从而使另一种与其相共鸣的情绪话语开始广泛流通并发挥塑造和教学的作用。例如,英雄主义叙述和自豪话语并不足以完整转化艾滋病患者复杂的情动状态,因此,随着剩余的情动状态的涌动,当初被英雄主义叙事所压制的这些令人不安的情动状态,逐渐被阐明和承认为身为同性恋的羞耻感和对社会排斥的恐惧,后续又进一步被引导和解释为对政府和国家的愤怒^②。换言之,集体情感并不是稳定和固定的,因为我们无法给非结构化的情动状态取一个单一的名字,它随着无定形的情动状态的阶段性转化而变化。

五、结语:集体情感是可以被操控的吗?

既然集体情感的产生是公共话语的流通、表达和教学将无定形的情动具体化为特定情绪的过程,那么集体情感可以被人为操纵吗?目前有大量文献关注领导人或精英如何培养民众的情感以达到自身的政策目的,或者如何运用民众熟知的情感符号和情感记忆来动员民众,这些研究关注的不是领导人无中生有地制造某种情感,而是如何识别并利用那些能够刺激公众情感的情感符号,进而塑造和操控民众的集体情感^③。但正如上文所述,情感符号只是部分地捕捉了情动状态,情动的剩余物仍然在或强或弱地涌动,寻求对自身意义的解释。因此,被反复提及的话语符号的教学作用是有限度的,并不能完全压制身体强度的其他出口。当情动剩余物足够强烈的时候,当下广泛流通的情感话语“可信度”就会下降,情感表达的自我改变效应就会转向弱化和否认一面,也就失去了情感教学的能力,从而导致另一种情感话语的流通和相对应的集体情感的出现。例如1986年以后,当ACT UP运动中的艾滋病患者继续用广泛流通的自豪感来表达他/她们的情动状态时,反而会让他/她们否认/弱化这种情绪,因为自豪这一话语并未能够让它们进入并有效理解此时此地的情动状态——某种一直存在但

^① Gould D., *Moving Politics: Emotion and ACT UP's Fight against AI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32, 63-64.

^② Gould D., *Moving Politics: Emotion and ACT UP's Fight against AI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55-179.

^③ Ross A.,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56.

未被英雄主义叙事所捕获的强烈不安,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同性恋的)羞耻和(对社会排斥的)恐惧的叙事开始获得共鸣并广泛流通^①。

因此,情动状态虽然是无结构的、模糊的,但并不是可以被随意揉捏成为任何具体形状。情动状态对个体自身甚至都是不透明的,对他人来说更是不可观察的,加之其无定形和模糊矛盾的特征,没有任何人可以准确地预测何种情感符号能够有效地捕获情动并获得广泛共鸣。在互联网舆论事件中我们经常发现,之前获得网民广泛共鸣的符号此次却毫无作用,或者相反,之前在差不多的情境或事件中未能引发集体情感的符号,在此次事件中却导致民众群情共振,广泛共鸣。换言之,并不是具备了齐全的社会热点要素就能够撩动网民的情感神经,形成某种集体情感,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很难按照组织者的预想产生组织者想要的某种集体情感,因为“即使是一场雨,也会破坏气氛”^②。所以,“由于情感体验的模糊性,领导人对情感政治的控制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少。情感操纵者不能事先预测某个符号、仪式或其他动员行为所能引起的一连串共鸣”^③。也正因为如此,情动理论家们纷纷开始关注政治宣传、大众媒体、视觉图像、广告、艺术等如何在意义和意图的阈值之下对个体的情动状态产生冲击,受影响的个体又是如何在没有认知内容输入的情况下,构成“情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④。

From Pre-Individual Affect to Social Emotion

—A Study of Collective Emo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 Theory

Tian Linn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P.R.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70s, an emotion turn has spread across various disciplines leading to a profound paradigm shift. Its focus are primarily on individual emotions, with collective emotions receiving relatively less attention. Existing studies on collective emotions, whether inclined towards the individualistic or the emergentist model, generally agree that collective emotions involve the convergence and aggregation of group member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certain events or objects. Both models, however, rest on an unquestioned assumption that there exists a prototype emotion or emotional program, which is either transmitted flawlessly between individuals or uniformly distributed to each member by the collective entity, leading to a homogenous emotional state among all individuals. This assumption overlooks the dynamic and “achievement” nature of collective emotions, implying that shared emotions are not preformed and immutable. Consequently, previous research on collective emotions has failed to adequately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or procedures that individuals, following specific events, interactions, or stimuli, share certain emotions through

① 通过事后回溯,可以分析得出这种无可名状的不安是由长久以来的社会排斥和不被承认导致的,但在当时,因为英雄主义叙事对其他叙事的压制,人们只是感到有些不对、有些不安,但缺乏进入这种感受的具体话语渠道。因此,一旦羞耻和恐惧叙事开始出现,就迅速产生情感/情动共鸣,产生一种“就是这样”的契合感。

② Riis O., Woodhead L., *A Sociology of Religious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4.

③ Ross A.,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56.

④ 露丝·雷斯:《情感的演化——20世纪情绪心理学简史》,李贯峰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99—400页; Papacharissi Z., “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 Sentiment, Events and Medial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 19(3), pp. 307-324.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ther than flawless transmission. Moreover, this presumption has not satisfactorily answered two closely related questions. Does the sharing of a certain emotion within a group require every individual to share the same feeling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onset (i. e. , is there a prototype emotion)? And, beyond this shared emotion, do individuals within the group also experience emotions beyond the scope of what can be shared?

This paper, grounded in affect theory, seeks to explore questions that prior studies have not effectively answered. It propos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emotions begins with each individual's vague and amorphous affective states, essentially transforming these pre-individual affective states into social emotions. This transformation allows what are originally embodie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to be disseminated in a form that is collectively comprehensible and thus exerts influence at a societal level. This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collective sharing of certain emotions. The final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emotions, however, hinges on three mechanisms: emotional circulation, expression, and pedagogy. Firstly, the widespread circulation of emotional discourse enables a multitude of individuals to engage with their vague affective states from a common perspective set by discursive symbols, fostering a close adherence among individuals. Secondly,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emotional discourse symbols makes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feasible.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not merely a display and notification of an individual's existing emotional state; it also reciprocally shapes the emotional state itself. Therefore, emotional expression through shared emotional symbols can collectively strengthen and confirm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ese symbols represent. Thirdly, emotional pedagogy, facilitated by the continual evo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se emotions, involv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emotional responses to instruct people what to feel and how to feel. This mechanism can endow certain emotions with a recognized naturalness, while suppressing potential alternative emotional responses within the group. Despite this, the fluidity of affective states cannot be fully captured or contained by emotional categories with explicit socio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presence of affective residuals suggests that collective emotions are not subject to arbitrary manipulation.

Keywords: Collective emotions; Affect; Emotional circula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Emotional pedagogy

[责任编辑:陆 影]